

論中國之命運

著者 艾思奇

論中國之命運

著者：艾思奇等

出版者：曉光社

經售者：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實價國幣

「中國之命運」——

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

艾思奇

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裏，論到了幾個哲學問題。這些問題，蔣先生是當作「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來提出的，這就是說，蔣介石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覆，是全書裏所表白的一套政治思想的方法基礎，這一套政治見解和哲學思想，是以「國父」主義的名義為標榜的，這就是說，作者自認為是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但事實上是怎樣呢？事實上是很可惜，在「中國之命運」裏並沒有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而只有關於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詞，以及在這些名詞裝飾下的中國式的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學，和反對科學唯物主義，提倡迷信盲從的，法西斯主義的唯心論哲學。

「中國之命運」裏的哲學思想，是一種極端不合理的唯心論。由於它的不合理，它和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裏任何一點進步因素都是絕緣的。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是有很大距離的，它有着保守的唯心論的方面，但同時不能否認，它也有進步的唯物論方面。但在「中國之命運」裏，却完全拋棄了它的進步的

唯物論的方面，并用種種附加的引伸，擴大了它的保守的唯心論的方面，下面就說明「中國之命運」裏有着怎樣一種極端不合理的唯心論，它是怎樣和中山先生「知難行易」思想中的進步因素「風馬牛不相及」。

(一)關於「誠」的思想。

在「國民今後努力之方向及建國工作之重點」一節裏，蔣介石先生開頭就引用了孫中山先生的一段話：「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萬事之期源也。」從這一唯心論的說教裏，「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先生進一步引伸出自己的許多論點，因此我們不妨從這裏談起。

任何事情，任何主張計劃，只要「吾心信其可行」，就一定行得通嗎？拿事實來證明，恰恰就有無數相反的例子。秦始皇自以為皇位可以傳到萬世，因此自己叫做始皇，那信心可夠大了，但結果是二世就歸於滅亡。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實行法西斯主義一千年，信心雖比秦始皇小一點，但看來也似容易些，結果只維持了二十一年，還算一切法西斯國家中壽命最長的。納粹的軍隊，曾自稱是世界無敵的，的確有足夠的信心，但現在在蘇聯也算碰得頭破血流了。大後方的限價政策，在開始實行之前，據說是「成功之券，決可計日而全」的，但差不多一開始就失敗得一

場籠罩了。推而言之，就是「中國之命運」裏所宣傳的一套反民主的政治主張，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企圖，以及遼遠渺茫的「實業計劃」的諾言等等，雖然說得津津有味，好像眼前差不多實現了的樣子，但實際上也必終歸是夢想。誰人不信，請看看將來的事實吧。

事實證明，信心並不能決定一切，同樣抱着信心去做的事，有的可以成功，有的必歸失敗。問題在於我們的主張和計劃的本身，在於信心的本身，有沒有可以成功的客觀條件。沒有一定的客觀條件，即是抱着天大的信心去做，也不過是唐吉訶德對風車的鬥爭，無結果的盲目冒險。什麼是那一定的客觀條件呢？一般的說，就是廣大民衆（尤其是工農勞動的人民）的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合乎這些發展要求的事情、主張、計劃，加上人的主觀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違反了這些要求的行爲，無論主觀上如何有信心，終歸是要失敗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否認「心」的重大作用，馬克思自己就說：「理論只要一掌握羣衆，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一年多來，我們在整風中間，學到了一個規律：「一切問題要從思想上來解決。」我們不否認思想對於工作的重大意義，但首先的問題是：我們的思想必須是正確的思想，必須是合乎廣大民衆的物質生活發展要求的思想，必須合乎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實質上本來就是民衆自己的思想，不過被領導機關，領導者集中起來，將民衆分散的無系統的思想，變爲集中的有系統的思想。因此再把這種思想宣傳出去，就能夠爲廣大民衆

樂意接受，通過他們的行動，發生偉大的實際力量，使工作能夠有很好的成效。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這樣一種思想。這種思想的正確性，爲中共二十二年來所實行的偉大革命事業所證明，爲抗戰以來的成果所證明，爲兩年以來實行三三制、生產運動、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軍擁政愛民運動與審查幹部的成功所證明。所謂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並不是說任何思想都可以解決問題，而是要掌握正確的、合乎中國具體情況的、合乎中國廣大民衆的要求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毛澤東的思想。這種思想之所以能夠有解決問題保證鬥爭勝利的力量，並不是單純由於思想本身的緣故，而是由於這種思想在中國社會上有堅強深厚的物質基礎，是中國實際鬥爭的反映。

我們唯物論者，對於任何一種思想，必須根據廣大民衆的物質生活發展要求，來檢查它的好壞。有些不合實際的思想，雖曾被誇張爲「如日月經天樣明白」，但如果把它拿到地上的民衆的行動中間來攷驗，它就會失敗得一塌糊塗，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政治主張裏給民衆提出了很多好聽的空洞的諾言與計劃，而在他的實際行動上却給民衆帶來了窮困災難，那麼，不管他的信心怎樣高，這種思想，這種主張和計劃之必然要破產，也正是「如日月經天樣明白」的。

如果說「心爲萬衆之源」，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裏，有時還有某些接近合理的因素——當他把這「心」解釋爲「萬衆的心」，解釋爲「人羣之需要」的時候，那裏面就有着某些可以接近唯

物論的構構，那麼，經過了「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先生的引伸，附加上中國舊封建時代的「誠」的思想，那合理的因素就是完全沒有了。蔣介石先生向「國民」要求說：「國民只須遵循主義，按照方略，順着成功的路線，窮理致知，實踐力行……所謂力行與致知，皆須出於至誠」，什麼是誠？乾脆地說，這裏之所謂誠也者，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詞，廟宇的菩薩，都要向善男信女要求誠心誠意的去敬它，蔣介石先生說：「誠者成也」，「不誠無物」，又說：「不誠則天下無能成的事，至誠則天下無不成之事」。這是說，信仰可以決定一切，不管什麼思想，什麼主張，只要你誠心誠意，不問是非，硬幹下去，蔣先生都可以為你寫一張包票；「一定成功！」這樣一種見解的錯誤，這種包票之不可靠，只要根據前面所說的一切，就很容易明白。

唯心論的「不誠無物」，是完全不對的，在事實上，在唯物論者看來，第一個命題是「無物不誠」，第二個命題方可提出「不誠無物」任何精神、思想、志願、信心，如果沒有客觀物質基礎，就一切都是空談，因為物質是本源的，第一位的，精神「誠」，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只有具備了充分物質基礎的精神「誠」，才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唯物論者的思想日程與工作日程是：一、「無物不誠」，必須使自已的一切思想意識都符合於廣大民衆的政治經濟要求；二、「不誠無物」麼，將我們的正確的思想意識，堅持下去，絕不動搖，絕不灰心喪志，一定要達到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完全成功。我們的唯物論哲學是與蔣介石先生的唯心論哲學完全相反的。

對於一切唯心論的東西，我們還可以提出和蔣介石先生完全相反的證明。「不誠有物」，「誠則無物」——對於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法西斯主義者以「國家」「民族」的名義來欺騙青年，沒有經驗的青年們都萬分真誠地爲他們犧牲了，有什麼「物」可得呢？以德國的例子來說，成百萬成千萬的青年變成了炮灰，德國「民族」「國家」所得到的除了巨大的災難又有什麼？倘若德國的青年不受納粹黨的欺騙，對希特勒沒有那樣大的誠心，無數青年的生命又何至於變爲無物，德國民族的災難又何至於如此深重呢？這樣的在意義上說，「不誠」反而可以「有物」，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法西斯主義者自己的「誠」是沒有物質基礎的，是違背客觀要求的錯誤思想；法西斯的欺騙宣傳，本來是違背社會經濟發展潮流的，法西斯主義者的目的，只是要把極少數最大最大的地主資產階級養得更肥，而對於大多數民衆，對於國家民族，並不算真正貢獻任何一點東西，相反，只是下決心壓迫民衆，剝削民衆，他們口口聲聲講「至誠」，並不是他們自己真正有什麼爲國家爲民族的誠意，而只是爲着要求民衆和青年誠心誠意地像羊一樣地受他們愚弄，只是爲着要得到受騙者的「至誠」。對於這樣一些騙子表示誠意，自然要一切落空，在這種情形下，「誠則無物」是必然的。因此，站在廣大民衆的立場上，站在青年的前途和幸福立場上，對於任何人的任何一種思想主張，都要看一看它在實際上做的結果怎樣，而不要只聽他說得怎樣，我們的哲學首先是「無物不誠」，如果你對於國家民族的任何意見沒有科學的客觀物質條

件，對於廣大勞苦人民（他們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代表者）以及青年（他們是國家民族將來的主人）的現狀與前途沒有真正「物」的真獻，那我們就說：這證明你的所謂「誠意」是空的，是假的，是騙人的；而我們也就不能那麼便宜對你拋出自己的一片誠心了。

唯心論和宗教是相通的，「誠」字在中國的使用，本來就是一個迷信的符號，我們的許多寺廟裏，許多測字攤上，常常掛着「誠則靈」的招牌，求神問卦的人，必須恭恭敬敬，把紙燭貢品，和自己血汗換來的金錢送給和尚道士，以表自己的誠心，至於這樣表示之後，是福是禍，仍要靠你自己的運氣，和尚道士是管不着的，如果有禍只算你自己倒楣，不必問爲什麼，若一定要問爲什麼，那反而要給你加上一個罪名：「不誠」，在「誠則靈」的號召之下，實際的結果，只是要無數善男信女節衣縮食，把少數寄生的和尚道士養得更肥更胖，蔣介石先生也有塊「誠則靈」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樣，不過是勒索貢品的幌子吧了。

法西斯主義者的唯心論的哲學，原來是一張空頭支票，它所以要對「國民」發出這張「誠」字號的空洞精神，教的支票，就因爲它沒有任何物質的準備金付給廣大民衆，尤其是工農勞動人民，試就「中國之命運」裏對「國民」所允諾的「三民主義」來看，實際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就民族主義來說，誰不知道當前的大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還在我們的國土上橫行着，而蔣介石先生對這事却倒好像對「國民」滿不在乎，反而說：「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民權主

義來說，蔣介石先生沒有一個字提到要給全國人民以民主權利，却公然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就民生主義來說，孫中山先生所常常關心的中國民生的最大問題：「耕者有其田」，以及大後方眼前迫切要解決的（或者說早就應該解決的）改善工農勞動人民生活的問題，蔣介石先生也一字不提，却長篇大論地修談着三十年五十年以後的「實業計劃」，也不怕有人要問：眼前的死生問題尚且解決不了，三五十年後的遙遠計劃又有什麼途徑能夠實現呢？如果眼前的人民都餓死了，如果抗戰不幸失敗了，三五十年以後還有誰來建國，還來建誰的國呢？

蔣介石先生主張建國工作必須從心理建設開始，在他所舉的五個要目——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中，他認為（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實為各項建設的起點），而把政治與經濟建設放在程序的最後一步，這一個唯心史觀的顛倒程序的意義，就是要把物質的諾言推到渺茫的將來，同時又夢想用這空洞諾言來撓取國民今天的愚忠。「必須改變國民過去消極和被動的心理，與提高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的道德。」這種說法，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所謂「國民」，是指全中國廣大的民眾（以工農佔最多數）而言，那麼，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心理，倒並不是那樣消極和被動的，他們的道德，比起少數達官巨富來，是高尙得不可比擬的，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國民的心理需要達官巨富們來改變，國民的道德需要達官巨富們來提高。現在的問題是貪官污吏腐敗政治和經濟剝削打擊了廣大民眾，壓抑了廣大民眾對國家民族的高尙道德

的發揮，所以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恰恰不在於「心理建設」，「倫理建設」，而在於怎樣整頓貪污之風和那種官僚資本壟斷下的破產經濟和腐敗政治，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只有這樣來解決問題，民衆對和平建國的積極性才會發揮出來，人民對於國家民族的高尚道德才能充分表現出來。這并不是空論，而是事實。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現了真實的民選政治就是活的例子。

所以，從廣大人民的階級立場看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者以唯心觀點來責備「國民」的心理「消極」、「被動」，責備他們對國家和民族道德不夠，說需要「改變」、「提高」，完全是無的放矢。但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制主義者的階級立場來說，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從統治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看來，國家民族就是他們自己，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利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而是他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利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他們責備「國民」，是因爲大多數人民爲他們少數利益的犧牲，擁護始終是消極和被動的，而不是因爲「國民」對抗戰建國事業被動和消極。他們所要提高的道德，乃是大多數人「誠心誠意」給少數人欺騙愚弄的道德。而不是因爲民衆真正缺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蔣介石先生關於心理建設的問題的提法，在事實上就只有這樣一個解釋，而蔣介石先生自己對於國家的政治經濟統治的實際情況，又證明的確只有這樣一個解釋。

總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宣傳唯心論的哲學，就因為他們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顛倒，而唯心論正符合了他們的這個需要。唯心論可以把白的看做黑的，好的看做壞的。不過爲要普遍宣傳唯心論，壓制唯物論，首先還得要一個物質基礎，就是用一切手段剝奪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在物質上剝斷了政權；在思想上也就剝斷了真理。仗着權力，把道理都霸佔到自己一方面，一個聲明，投敵叛國的軍官就被渲染成抗日英雄，一紙「軍令」，就可以把堅決抗戰的軍隊譏作「叛軍」。明明是腐敗政治摧毀了民衆的抗戰積極性，却說「國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不夠高尚。嘴上「公」，實際上是借此爲私。嘴上說要「不知有私」，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反對的鋒芒却是向着真正公忠體國的抗日黨派和廣大民衆。「國家」「民族」是少數人壟斷的，所以「公」也是少數人壟斷的。不適合於這統治的少數達官巨富的利益的事，就被認爲「私」。這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們領教得太多了，中國的人民，受蒙蔽也不會太久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也有了自己的一部份物質保障，這就是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存在。所以唯心論的剝斷，在中國境內已不能絕對橫行，若論唯心論的將來結果，那也只能是唯心的幻想吧了。

(二) 關於知與行的思想

中國之命運一書在德者反德者的唯心論哲學。在「誠」的名義下，蔣介石先生提高了信仰

和迷信，貶低了科學的客觀知識。蔣介石先生對於知識來源的見解，就是明顯的證明。依蔣介石先生的意見，知識不是來自客觀事物規律的反映，而是來自人類生來的本性。「知的本源在於人類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說，我們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經驗和教訓，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然而就實質上說，知識如果「無得於己」，便不能算是真知」。

何等荒謬，何等腐朽的唯心論！居然可以把民族鬥爭經驗教訓所證明的知識和科學技術知識都叫做「表面」的知識，而把人的所謂「本性」裏的一種莫明其妙的什麼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蔣介石先生沒有說清楚）當做所謂「真知」。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竟來宣傳這種反科學的思想，除了法西斯主義的狂言囂語之外，是找不到它的任何比擬的，請看已經毀滅的法西斯老祖宗墨索里尼怎麼說：

「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念，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知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志的觀點。它引導個人提高，使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試問這裏所說的一切，和「中國之命運」裏的見解有什麼實質上的分別？法西斯主義的知識論，就是要破壞科學的合理的知識，對人民灌輸一種神祕的宗教信仰。漢奸周佛海還未公開投敵的時候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中國之命運」裏所謂出自「人類的本性」的「真知」，除了把它看做這種盲目的信仰與盲目的服從之外，是找不到

別的解釋的；因為它把經驗的科學的知識都降低到「表面」知識的地位。試問世界上除了實際經驗所證明的知識，除了科學知識之外，還有什麼真正合理的知識？輕視這種知識，就是輕視理性，反對真理。所以，「中國之命運」裏所說的「真知」，實際上是等於「無知」；而蔣介石先生生在「真知」的名義下向「中國人民」要求的，只是糊裏糊塗的盲目信仰與盲目服從，渾渾噩噩的跟着腐朽到頂點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藉以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黨專政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中國境內蔣介石輩一切反動唯心論宣傳，其真正的目的全在於此。

舉例來說，蔣介石先生對於有些革命先烈的英勇犧牲精神所給予的讚揚和解釋，就包含着這樣的意義：

「爲什麼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呢？他們篤信只有革命纔可以救國救民，他們就力行革命工作，死生榮辱，置於度外。他們的「知」本於天性，他們的「行」發於真知，纔造成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的偉大事業。」

這裏包含着以下的見解：第一，所謂「本於天性」的「真知」，就不外是篤「篤信」。第二，革命先烈之所以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就是由於有了這種「真知」。第三，只憑着這種「真知」，就能夠完成偉大的事業，這些見解，是對於革命先烈的犧牲精神作片面的讚揚，而對

於他們的思想 and 事業，不給與任何忠實的客觀的估計。不錯，對於每一個時代的眞正革命者的英勇犧牲精神，我們是應該讚揚；應該學習的。但作爲一個現在的革命者的我們，作爲歷史上一切革命事業的眞正繼承者的我們，對以往的革命者首先應該關心和研究的，是他們的具體的思想和事業，是他們的正確和錯誤，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先烈們的犧牲精神是一回事，他們對革命的認識是否能達到了絕對的「眞知」，又是一回事。除非人類的思想永遠不會進步，否則我們就要忠實的承認，過去的革命者，由於時代的限制，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革命者，由於沒有完全的科學方法，只憑形式邏輯或經驗主義看問題，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是常常不夠或錯誤的。以孫中山先生自己的例子來說，在國民黨改組時他就承認過去革命方法的不對，如果說他的「知難」學說有進步意義，那意義就在這裏。眞正有革命良心的人，應該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榜樣。所以，對革命事業能夠「篤信」，並不等於所「篤信」的就全是「眞知」，而能夠篤信，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並不能保證事業一定成功；要保證事業成功，不是空洞的「篤信」可以奏效的，第一要有正確，完全的認識作爲指南；第二，在這正確完全的認識上建立我們堅強的信心，或所謂「篤信」，這就是說，我們的信心或「篤信」是和正確、完全的認識一致的，是分不開的；第三必須要有羣衆的力量——物質的力量作基礎，必須通過羣衆的革命鬥爭去推行我們的事業，才能保證成功——這些就是我們唯物論者的了解。辛亥革

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這自然是一大成績。但民主革命並沒有成功，中國的半殖民地制度與半封建制度並沒被推翻。這一方面固然也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於先烈們對革命的認識不夠，而這認識不夠是包括當時孫中山先生自己在內的。中山先生始終以爲辛亥革命已經是「破壞的革命」的成功，而沒有看到，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來說，辛亥革命的破壞革命的破壞是根本沒有成功的，這一個不正確的認識，不正是使中山先生的活動始終束縛在軍人政客圈子裏，不能與真正革命的羣衆相結合，而一直到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總是在自己陣營裏碰釘子的原因嗎？

把「篤信」當做「真知」，用信仰代替知識，以先烈的犧牲精神作爲神聖的崇拜的偶像，不學習他們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不是尊重先烈，而是想利用先烈白骨，來驅取青年的熱血和顛顛，好使青年們跟着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者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藉以維持國人皆可廢，天下人皆可廢的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腐敗統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這裏已轉到了行的問題：蔣介石先生對「行」是非常看重的，蔣介石先生自己並認爲是在倡導着「力行哲學」，有時甚至於把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省去一半，簡單地稱做「國父的（行易）哲學」，甚麼是「行」？如果只滿足於字面上的解釋，那麼，蔣介石先生的答覆自然也是「革命工作」的「行」。但就實際上來看，蔣介石先生所謂的「力行」，和真正的革命的實踐，

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蔣介石先生所要求的「力行」，如前面說過的，是憑藉「誠」；憑藉着所謂出於「本性」的「真知」，憑藉着對於「主義」，對於「領袖」，對於先烈，對於「國父」的偶像化的信仰，那就是宗教式的崇拜行爲，這是反動的行爲，而不是真正革命的行爲，真正革命的行爲，必須有科學的客觀規律知識爲指導，必須具體而深刻地了解周圍的實際情況，必須正確地認識民衆，尤其是工農勞苦民衆的希望和要求，必須和廣大人民在一起，依照着地上的現實的人民所要求的方向，而不是依照着任何偶像化了的個別人物的要求和他們所謂「如日月經天一樣」的什麼「主義」去行動。其次，與上面相關聯，蔣介石先生所要求的「力行」，是盲從的行爲，是要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想把封建時代愚民政策的統治施行到今天，所不同的，是曲解和利用了「科學方法」的名義。蔣介石先生說：「依照科學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專職的原理，知者與行者雖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須分工。」這就是說，知者不一定要力行，而行者也不必要有知，這也叫做科學方法嗎？真是冤枉了科學方法！實際上正是按照科學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雖然有分工專職，而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己所專的一部份職務，必須具有正確的完全的知識，同時對於整個工作也要具有一般的正確知識，否則就無從完滿地擔負起自己的分工專職。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決不能讓一些無知無識的人，例如達官巨富們來幹，革命工作裏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固然是一種分工，然而這種分工決不是知者與不知者的分工，領導者指示總的鬥爭方向，